

收稿日期:2020-11-05

# 共情能力对大学生道德判断的影响： 内疚感和伤害感知的链式中介作用

王冬琳, 杨海波

(闽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为探讨大学生共情能力与道德判断的关系以及内疚感与伤害感知在两者间的作用,本研究采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内疚感问卷、伤害感知问卷和道德判断问卷对某高校55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共情能力、内疚感和伤害感知可显著预测道德判断;内疚感、伤害感知是共情能力与道德判断间的中介变量;内疚感与伤害感知在共情能力与道德判断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这说明共情能力、内疚感与伤害感知是道德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共情能力除了能直接预测道德判断,还可以通过内疚感、伤害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道德判断,这为探讨影响大学生道德判断的因素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

**关键词:**共情能力;内疚感;伤害感知;道德判断;道德理论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1-0117-08

**作者简介:**王冬琳(1996—),女,陕西渭南人,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道德决策研究;杨海波(1978—),男,福建漳州人,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工语法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1.014

不论是否与自己相关,人们总是会对社会上的事件或现象进行是非好坏的判断,即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它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焦点问题<sup>[1-3]</sup>。如今网络信息量暴增,而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参差不齐,如何提高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也成了最近几年研究的热点<sup>[4-5]</sup>。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忽略了情感的影响<sup>[6]</sup>,而共情作为建立社会关系和进行日常决策的基本情感,是影响道德判断的关键因素<sup>[7-9]</sup>。共情(empathy)与道德判断存在正相关,共情反应会促使个体从他人的视角感受情绪与痛苦,做出与道德相关的行为或对违规行为进行更为严苛的判断<sup>[8,10]</sup>。共情能力高的个体在道德决策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生理和脑电活动,并会对受害者进行亲社会行为,而共情障碍的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倾向于选择功利主义决策<sup>[11-14]</sup>。因此,培养大学生共情能力与研究共情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对提升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Gray的道德二元论认为道德判断是由规范违反(norm violation)、核心消极情感(negative core affect)与伤害感知(perceived harm)三者结合产生<sup>[15]</sup>。处于消极状态下的个体,即使消极情

绪不明显,仍对消极事件(如规范违反)敏感,做出更严苛的道德判断<sup>[16]</sup>。而高共情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更容易体验到消极情绪<sup>[17]</sup>。Sarlo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考察了个体的共情能力对道德判断过程中行为和神经反应的影响,发现共情的个人困扰(其中一个维度)能显著正向预测个体在道德判断中的主观消极情绪体验和与情绪反应有关的P260波幅<sup>[17]</sup>。其他研究也表明:消极道德情绪(厌恶感)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道德判断,还可以影响伤害感知<sup>[18]</sup>。而内疚感(guilt)同样作为一种典型的消极道德情绪,是在移情的基础上个体良心的反省,是个体对行为负有责任的,指向自身的一种负性体验<sup>[19]</sup>。共情能力与内疚感呈正相关<sup>[20]</sup>,共情能力低下的青少年罪犯很难感受到内疚情绪<sup>[21]</sup>,而共情能力高的个体在规范违反的情境下更容易体会到内疚感,从而影响道德判断<sup>[22]</sup>。正如Takamatsu和Takai的研究发现缺乏共情能力的精神病人难以感知他人的感受,无法产生内疚感,表现出对道德违规行为的不在意<sup>[14]</sup>。另外,在Tangney、Stuewig、Mashek和Hastings的研究中发现:内疚倾向高的个体会导致人们以道德的方式思考、感受和行为<sup>[23]</sup>。了解一个人的内疚感水平有助于我们预测这个人产生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sup>[24]</sup>。因此,内疚感在共情与道德判断之间起一定的作用。

伤害感知由有意图的施害者(an intentional agent)、经受痛苦的被害者(a suffering patient)以及两者的因果关系(causally link)三大成分构成<sup>[25]</sup>。研究发现道德判断以感知到有意图的施害者造成被害者痛苦为依据<sup>[26]</sup>。伤害感知处于不同的情境或文化中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认知,即使这种伤害只是主观上的感受,没有客观存在,只要被个体所感知到,就会影响道德判断<sup>[27]</sup>。而共情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可以感知到他人经历的灾难与遭受的痛苦,共情能力低的个体相较于高共情的个体,削弱了对受害者痛苦感知的程度,很难感受到受害者正在经历的痛苦,更倾向于做出功利主义决策<sup>[14,28]</sup>。也有研究认为:缺乏共情的精神病人主要是因为杏仁核神经活动的减少导致对伤害厌恶的减少,从而做出功利主义决策<sup>[29]</sup>。共情-利他假说认为:共情高的个体常关注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例如伤害),并且会为了避免给他人造成痛苦而改变自己的不当行为或更严厉地指责他人的行为;而共情低的个体较少考虑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后果<sup>[30]</sup>。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共情通过伤害感知间接影响道德判断。

综上所述,共情通过内疚感和感知伤害的能力间接影响道德判断。个体自身内疚感的高低会影响对事件的看法。进化心理学认为:内疚感是从Haidt和Joseph提出的传统道德理论中的关怀/伤害模块进化而来,具有一定的适应性<sup>[31]</sup>。内疚感作为一种可测量的道德情绪,有研究发现:当内疚情绪被唤醒后在对不道德行为进行判断时,会影响个体对事件的道德判断,即对关怀/伤害维度的道德判断更加严苛,认为不道德行为更加不道德<sup>[32]</sup>。还有研究认为:共情高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到内疚感,内疚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关注行为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和受害者的痛苦程度<sup>[20]</sup>。共情引起的内疚感在伤害情境中更能体会到他人的感受与痛苦。也就是说,内疚感高的个体在规范违反的情况下可以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产生不愉快的情绪体验,从而影响道德判断<sup>[33]</sup>。因此,本研究提出链式中介“共情→内疚感→伤害感知→道德判断”的假设。

## 一、研究方法

### (一)被试

选取某高校55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回收问卷中不认真作答或连续4个以上题项未作答的无效问卷,最终确认有效问卷526份,有效回收率95.64%。其中男生179人(34.03%),女生347人(65.97%)。被试平均年龄为19.23±1.65岁。

## (二) 测量工具

### 1.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是由 Davis<sup>[34]</sup>基于共情的多维理论建构所编制的测量共情能力的工具,中文版由台湾学者修订(IRI-C),问卷由 22 个题目组成,包括幻想、同情关心、观点采择、个人忧伤四个维度, $\alpha$ 系数为 0.75。采用五点计分,从“1”(非常不恰当)到“5”(非常恰当),分值越高表明共情能力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的  $\alpha$ 系数为 0.76。

### 2. 内疚感量表

采用日本学者 Arimitsu K 编制,胡金生<sup>[35]</sup>修订的中文版内疚感问卷,问卷由 37 个题目组成,包括伤害他人、自私行为、辜负他人和关爱不足四个维度,四个维度  $\alpha$ 系数在 0.73—0.80 之间。采用五点计分,从“1”(不内疚)到“5”(很内疚),分值越高表明个体越容易产生内疚感。该量表在本研究的  $\alpha$ 系数为 0.93。

### 3. 道德判断问卷

参考道德判断问卷<sup>[36]</sup>,共包含六个道德判断场景,分别为“踢流浪狗、嘲笑胖子、伪造材料、欺负小孩、偷东西以及殴打别人”, $\alpha$ 系数为 0.71。要求被试阅读材料,并对材料中主人公行为的道德程度进行判断,采用 7 点等级评分,从“1”(没有不道德)到“7”(极其不道德)。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  $\alpha$ 系数为 0.83。

### 4. 伤害感知判断材料

参考伤害感知判断问卷<sup>[36]</sup>,共包含六个感知伤害判断, $\alpha$ 系数为 0.71。要求被试阅读材料,并对材料中主人公行为的伤害感知程度进行判断,采用 7 点等级评分,从“1”(没有伤害)到“7”(伤害极大)。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  $\alpha$ 系数为 0.76。

## (三) 数据处理

采用 Epidata 与 SPSS 22.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的录入和相关分析处理,采用 AMOS 23.0 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同时检验中介效应。

## 二、结果与分析

###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研究数据来源单一,且采用的是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 CMB),故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共情、内疚感、伤害感知与道德判断 4 个变量的所有项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仅能解释 20.83%,远小于临界值 40%,且有 14 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表明本研究不存在较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 (二) 共情、内疚感、伤害感知与道德判断的相关分析

对共情、内疚感、伤害感知与道德判断做 Pearson 相关分析,各变量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表 1 所示)。结果表明:共情、内疚感、伤害感知与道德判断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1. 共情	3.433	0.379	—			
2. 内疚感	4.181	0.535	0.285**	—		
3. 伤害感知	6.216	0.677	0.219**	0.355**	—	
4. 道德判断	6.177	0.846	0.216**	0.314**	0.672**	—

注:\*\*  $p < 0.01$

### (三) 中介效应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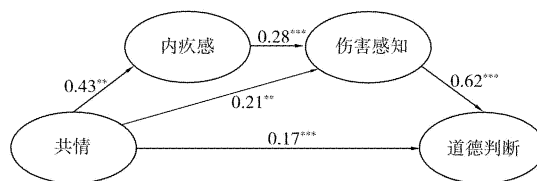
#### 1. 内疚感与伤害感知的单一中介效应检验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分析内疚感与伤害感知对道德判断的作用机制。通过 AMOS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共情是自变量,内疚感与伤害感知是中介变量,道德判断是结果变量。首先,以内疚感作为单一中介变量建立模型,结果显示: $\chi^2/df=3.453$ , $RMSEA=0.068$ , $CFI=0.971$ , $TLI=0.958$ , $SRMR=0.017$ ;其次,以伤害感知作为单一中介变量建立模型,结果显示: $\chi^2/df=2.414$ , $RMSEA=0.052$ , $CFI=0.981$ , $TLI=0.964$ , $SRMR=0.018$ ,模型拟合较好;然后,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取样 5 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内疚感的中介效应值为 0.090,中介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为 [0.050, 0.144],效应量为 24.77%;伤害感知的中介效应为 0.200,中介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为 [0.129, 0.280],效应量为 55.65%。

表2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

结果类型	效应值	BootSE	Boot95%CI		效应量(%)
			Low	High	
总效应	0.370	0.054			
直接效应	0.167	0.420	0.087	0.251	45.14
共情-伤害感知-道德判断	0.130	0.038	0.058	0.205	35.14
共情-内疚感-伤害感知-道德判断	0.073	0.019	0.042	0.115	19.73

注:效应量越大,路径效应就越强



注:\*\*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图1 共情、内疚感、伤害感知与道德判断的链式中介模型<sup>①</sup>

#### 2. 内疚感与伤害感知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以内疚感与伤害感知共同作为中介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sup>①</sup>  $d=0.2$ 、 $d=0.5$  和  $d=0.8$  分别对应于小、中、大的效应量,图1除直接效应外均为中介效应量,显著即证明路径有效。间接效应值越大,说明中介效应越显著,同时会减弱直接效应,直接效应显著为部分中介模型,直接效应不显著为完全中介模型。

$\chi^2/df=3.00$ ,  $RMSEA=0.063$ ,  $CFI=0.973$ ,  $TLI=0.962$ ,  $SRMR=0.016$ , 表明模型拟合结果良好。因此,该模型可接受。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取样 5 000 次进行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伤害感知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为 0.130,中介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为  $[0.058, 0.205]$ ,效应量为 35.14%;链式中介效应为 0.073,中介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为  $[0.042, 0.115]$ ,效应量为 19.73%。根据图 1 可知,内疚感与伤害感知是共情与道德判断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因此链式中介成立。

### 三、讨论

本研究基于道德理论,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共情能力对大学生道德判断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获得了一些初步研究结果:共情能力正向预测道德判断,内疚感和伤害感知可以作为共情影响道德判断的单一中介变量<sup>[18,25]</sup>,同时链式中介也同样成立。

#### (一)内疚感与伤害感知的单一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内疚感在共情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单一中介效应量为 24.77%。Greene 双加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种快速的、受情绪反应驱动的直觉加工过程,个体在面对道德违规情境时,启动情绪加工,并做出道德直觉判断。即高共情的个体自我调节功能处于激活状态,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与情感,往往能感受到更核心的消极情绪,对违规行为或违反自身道德标准的事件产生较强的内疚感,倾向于帮助他人或谴责不道德行为。另外,相对于内疚感,伤害感知在共情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单一中介效应量较大,为 55.65%。这不仅支持了伤害感知作为共情与道德判断之间的中介变量的假设,还表明伤害感知是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这个结果很好地印证了 Gray 提出的道德二元论:伤害感知是影响道德判断的核心因素,即高共情个体主要是通过对受害者伤害的感知程度影响道德判断,高共情的个体在道德违规的情境下往往最能体会到他人的痛苦感受,影响对道德违规事件的看法与判断,对伤害感知程度越深,道德判断分数越高,这是因为高共情个体对于伤害的厌恶(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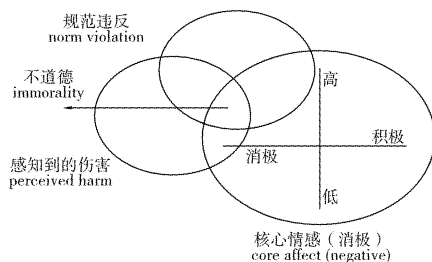


图 2 道德二元论认为道德判断是由规范违反、核心情感(消极)与伤害感知三者结合产生

#### (二)内疚感与伤害感知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道德理论建立链式中介模型提出了道德判断的作用机制的假设:共情除了能直接预测道德判断,也可以通过内疚感与伤害感知间接影响道德判断。结果表明总间接效应量达到了 54.87%,说明共情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大部分是通过内疚感与伤害感知的中介发挥作用的,该中介效应对解释共情影响道德判断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了链式多重中介的假设,链式中介的效应量为 19.73%。内疚感到道德判断的路径系数不显著,但其他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在链式中介模型中,内疚感基本是通过伤害感知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的。

从链式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来看,高共情个体在道德违规的情境下越容易产生消极道德情

绪,即内疚感。已有研究表明:伤害感知在消极道德情绪与道德判断之间起中介作用<sup>[25]</sup>,高共情个体更能体会到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提高了感受处于伤害情境下受害者的消极情绪和痛苦的敏感性,而高内疚感个体通常关注他人或事件造成的伤害和受害者的痛苦程度,内疚感越高,个体更易产生自责,从而对不道德事件或施害者有更多消极的评价。传统道德理论将伤害划为第一领域,当个体处于该领域时,会导致其更多地关注情境中的伤害因素,高内疚感个体对伤害感知的程度越高,更倾向于对规范违反行为做出不道德判断或做出亲社会行为。而且脑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大脑中关于情绪处理的 vmPFC 区域和负责共情的 bvFTD 区域损伤的患者,相对于其他脑损伤患者,在个人道德困境中的功利判断有所提升<sup>[15]</sup>,证实了道德二元论提出的在规范违反的情境下,更高的消极道德情绪与伤害感知的结合产生道德判断。而且个体越强烈地感受到内疚情绪,会更关注造成伤害的程度,内疚感高的个体会有动机补偿这种不道德行为,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要求,做出道德行为。因此,链式中介“共情→内疚感→伤害感知→道德判断”的路径具有合理性。

另外,在链式中介中,内疚感到道德判断的路径系数不显著,说明内疚感在链式中介中基本通过伤害感知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但内疚感作为共情与道德判断单一中介变量却成立。说明当个体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时,首先会对痛苦程度进行评估,痛苦程度越大,不道德判断分数越高,在这个心理过程中已经掺杂了认知加工的成分,不再完全属于道德直觉判断,情绪加工仍然存在,但会通过伤害感知的程度共同影响道德判断。

### (三)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通过提升大学生共情能力,培养其对受害者伤害程度的感知与规范违反的内疚情绪,从而帮助大学生积极面对当前的社会形势并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但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1)本研究尚未探讨影响道德判断的生理机制,后续的研究者可以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方法进一步探索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2)本研究的伤害感知问卷只是简单地讨论了个体感知到的伤害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后续研究可以将伤害进行分类,如从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多方面、多方位考察伤害感知对道德判断的影响;(3)道德判断受个体所处文化背景的影响,所以今后的研究需要注重跨文化研究。

## 四、结论

共情能力、内疚感和伤害感知可显著预测道德判断;内疚感、伤害感知是共情能力与道德判断间的中介变量;内疚感与伤害感知在共情与道德判断中起链式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共情除了能直接预测道德判断,还可以通过内疚感、伤害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道德判断。研究结果很好地印证了道德二元论,也很好解释了共情能力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 参考文献

- [1] GREENE J. Emotion and Cognition in Moral Judgment: Evidence from Neuroimaging[J]. *Neurobiology of Human Values*, 2005, 5(16):57-66.
- [2] MOLL J, ZAHN R, DE OLIVERIRA R, et al. Opinion: the neural basis of human moral cognition[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05, 6(10):799-809.
- [3] 李小晶,李红. 坏念头,罪几何? 意图信息的强弱变化对大学生道德判断的影响[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4, 30(3):244-251.
- [4] 金文斌. 大学生道德领域的焦点问题及提升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 7(3):127-129.

- [5] 张红霞,赵金.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道德理性培育论析[J]. 思想教育研究,2019,8(11):63-67.
- [6] SCHWARZ, N. Emotion, cognition, and decision making[J]. *Cognition & Emotion*, 2000, 14(4): 433-440.
- [7] WILLIAM, J, BRAD, et al. Emotion shapes the diffusion of moralized content in social network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114(28): 7313-7318.
- [8] DECETY J, COEALL J M.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empathy[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4, 18(7):337-339.
- [9] 陈武英,刘连启. 情境对共情的影响[J]. 心理科学进展,2016,24(1):91-100.
- [10] PATIL I, SILANT G. Reduced empathic concern leads to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in trait alexithymia[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4, 5(5): 501-501.
- [11] GLEICHGERRCHT E, YOUNG L. Low levels of empathic concern predict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J]. *Plos One*, 2013, 8(4):78-90.
- [12] KOENIGS M, KRUEPKE M, ZEIER J, et al.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in psychopathy[J]. *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11, 7(6):708-714.
- [13] MASTEN C L, MORELLI S A, EISENBERGER N I.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pathy for 'social pain' and subsequent prosocial behavior[J]. *Neuroimage*, 2011, 55(1):381-388.
- [14] SCIENCES P D, UNIVERSITY N, NAGOYA, et al. With or without empathy: Primary psychopathy and difficulty in identifying feelings predict utilitarian judgment in sacrificial dilemmas[J]. *Ethics & Behavior*, 2017, 29(1): 71-85.
- [15] GRAY K, SCHEIN C, CAMERON C D. How to think about emotion and morality: circles, not arrows[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7, 17(6):41-46.
- [16] 杨青松. 时间距离对道德违规行为判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 [17] CECCHETTO C, KORB S, RUMIATI R I, et al. Emotional reactions in moral decision-making are influenced by empathy and alexithymia[J]. *Social Neuroscience*, 2017, 18(4):1-15.
- [18] SARLOM, LOTTOL, RUMIATIR, et al. If it makes you feel bad, don't do it! Egoistic rather than altruistic empathy modulates neur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in moral dilemmas[J]. *Physiology & Behavior*, 2014, 130(7):127-134.
- [19] BAUMEISTER R F, STILLWELL A M, HEATHERTON T F. Guilt: an interpersonal approach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4, 115(2):243-267.
- [20] HOWELL A J, TUROWSKI J B, BURO K. Guilt, empathy, and apology[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2, 53(7):917-922.
- [21] SCHALKWIJK F, STAMS G J, STEGGE H, et al. The Conscience as a Regulatory Function: Empathy, Shame, Pride, Guilt, and Moral Orientation in Delinquent Adolesc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2014, 60(6):675-693.
- [22] OCTOBER. Dealing With the Past and Facing the Future: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Collective Guilt and Sham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 38(4):669-684.
- [23] TANGNEY J P, STUEWIG J, MASHEK D, et al. Assessing Jail Inmates' Proneness to Shame and Guilt: Feeling Bad About the Behavior or the Self[J]. *Criminal Justice & Behavior*, 2011, 38(7): 710-734.
- [24] COHEN T R, PANTER A T, TURAN N. Guilt Proneness and Moral Character[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 21(5): 355-359.
- [25] SCHEIN C, GRAY K. Moralization and Harmification: The Dyadic Loop Explains How the Innocuous Becomes Harmful and Wrong[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16, 27(1):62-65.
- [26] CHELSEA, SCHEIN, KURT, et al. The 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 Reinventing Moral Judgment by Redefining Harm[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a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c*, 2017, 30(8): 32-70.

- [27] 詹泽,吴宝沛. 无处不在的伤害:二元论视角下的道德判断[J]. 心理科学进展, 2019, 27(1):128 - 140.
- [28] MARSH A, CARDINALE E M. When psychopathy impairs moral judgments: neural responses during judgments about causing fear[J]. *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14, 9(1): 3 - 11.
- [29] BARTELS D M, PIZARRO D A. The mismeasure of morals: Antisocial personality traits predict utilitarian responses to moral dilemmas[J]. *Cognition*, 2011, 121(1):154 - 161.
- [30] BATSON C D, BATSON J G, SLINGSBY J K, et al. Empathic joy and the 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1, 61(3): 413 - 426.
- [31] HAIDT J, GRAHAM J. When Morality Opposes Justice: Conservatives Have Moral Intuitions that Liberals may not Recognize[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7, 20(1):98 - 116.
- [32] 杜灵燕. 内疚与羞耻对道德判断、道德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D].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2.
- [33] EISENBERG, NANCY.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0, 51(1):33 - 38.
- [34] DAVIS M H.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Evidence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 44(1):113 - 126.
- [35] 胡金生. 中文版内疚感问卷的信、效度及调查结果[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8, 36(2):236 - 238.
- [36] GRAHAM, JESSEHAIDT, JONATHANNOSEK, et al.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6(5):1029 - 1046.

## The Influence of Empathy on College Students' Moral Judgment: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Guilt and Perceived Harm

WANG Dong-lin, YANG Hai-bo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empathy ability and moral judgment, as well as the role of guilt and harm perception in it, and to provide suggestion for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moral judgment ability. This study selected 550 college students to conduct a survey by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 (IRI-C), guilt questionnaire, harm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and moral judgment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empathy ability, guilt and hurt perception we can easily predict moral judgment. Guilt and harm perception are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s between empathy ability and moral judgment, which play a chai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latter. Therefore, empathy ability, guilt and harm perception ar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ral judgment. Empathy ability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 moral judgment, but also indirectly influence moral judgment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function of guilt and harm percep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effective data support for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moral judgment.

**Key words:** empathy; guilt; perceived harm; moral judgment; moral theory

〔责任编辑:陈济平〕